



# 王粲集注

吴云 唐绍忠

中州书画社

0068/29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中华书局新校点本作基础,并参考其他辑本,对王粲现存诗文作了较详明的注释,附有《英雄记》、《王粲年谱》、《王粲资料汇编》。这是一本学习与研究建安文学及王粲其人的重要文集。

## 王 粲 集 注

吴 云 唐绍忠注

责任编辑 许树禄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南省信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 7.5印张 170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统一书号10219·55 定价 0.85 元

## 序

天津师范学院古典文学教研室吴云同志和他的学生唐绍忠同志，年来致力于注释《王粲集》，孜孜不倦，用力甚勤。工竣，嘱我写一篇序。我对中国古典文学虽也偏好，但素乏系统深入研究，本无资格为本书作序。但因与吴云同志结交已廿余年，目睹其治学成长过程，喜他有今日这样的成就，倒也愿意借此机会简介他治学走过的路，以与有志于古典文学的中、青年人共勉。

吴云同志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是研究鲁迅著作专家、当时的系主任李何林先生的学生。他毕业后，长期致力于钻研鲁迅著作。积若干年心得，曾出版专著《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陶渊明论稿》等书。他对于鲁迅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文学艺术遗产的精神和观点是深有体会的。吴云同志目前担任的教学任务是汉魏六朝文学史，于此也可见他受鲁迅先生影响之深。

“学然后知不足”，这是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吴云同志正是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中，逐渐认识到不在文字基本功上下苦功夫，研究工作是深入不下去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古籍。因而，他把功力转到校勘、注释、训诂上来。廿余年来，他未因生活清寒而稍馁其志，文化大革命中也未随波逐流而暂易其辙。虚心向学，博征多问，终于做出成绩来。《王粲集注》只是他治学征途上小小的一处打尖站而已。

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这是一项关系

到子孙后代十分重要的工作。由于历史的演进，语言的变化，中国古籍中的文字，越来越需要做好标点、注释、校勘、训诂等工作。要做好这种工作，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学力，更需要有严肃认真、埋头苦干的精神。即以注释而论，须知一处粗心的误注错释，谬种流传，对于青年后学贻误匪浅，这是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们不能不引以为戒的。但正是由于现存的古籍多有散佚误刊之处，所用文字或典故，又间或艰深怪僻，因而对今日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只能要求其精益求精，不能要求其百不失一。

读中国文学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有建安七子，而读过并能读懂建安七子诗文的人恐为数不多。王粲为建安七子之冠，他的《登楼赋》为一代抒情赋的名篇。《王粲集》经中华书局校点，现又经吴云、唐绍忠二同志注释，相得益彰。相信此注本的问世，将受到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们欢迎。

高承志

一九八一年冬至于天津

## 前 言

王粲（公元一七七——二一七），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一说河南修武）人。在我国中古的建安时代，他的文学成就卓著，被称为建安“七子之冠冕”（刘勰语）。他出身名门，曾祖父王龚和祖父王畅皆为汉朝三公。粲少遭董卓之乱，先依刘表，未被重用。后投归曹操，官至侍中。流离生活给他以深刻影响，使他写出许多优秀作品。王粲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赋两方面。这里重点就王粲的诗、赋创作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几方面试作论述。

### （一）

中华书局新校点的《王粲集》，存诗十九首，歌四首。王粲诗的成就主要在于五言诗，四言诗远远不能与之相比。粲的四言诗尽管较《诗经》在表达感情上更细腻了，语言也更富有概括力了，但还是可见明显的因袭的痕迹。他的四言还缺乏大胆的突破，只是做了些局部的“改良”。然而，当我们读到曹操的四言诗时，耳目却为之一新。曹操的四言可谓大刀阔斧地超脱，自铸伟词，不同凡响，可称为是四言诗的“革命”。曹操的四言之所以能给我们全新的感觉，就是因为曹操的四言中有全新的内容，有建安时代的进取精神。而王粲的四言诗，不仅是在写作艺术上

没有超脱《诗经》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内容上没有反映时代精神。王粲四言仅限于赠别、思怀，情深有余，悲而不壮。创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内容的创新。王粲的四言正缺乏这些，曹操的四言正拥有这些；相比之下王粲四言诗的弱点就十分明显了。

王粲的五言诗则不然，他的五言诗在整个建安文学中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五言诗与曹操和曹丕的诗相比不仅不逊色，有的佳作还可和曹植的诗比美，为历代论家所推崇。

钟嵘称：“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植）、刘（楨）间别构一体，方陈思（曹植）不足，比魏文（曹丕）有余。”（《诗品》上）钟嵘对王粲在建安时代诗歌史上的地位的评价，较为中肯。

王粲在《七哀诗·其一》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悲惨的离乱图。军阀混战的东汉末年，王粲这样的豪门贵族迁徙避乱固然可悲，而蒙受灾难最深重的还是贫苦的大众。此诗十分真实地记叙了王粲在避乱途中所见。“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十个字非常直观地概括了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后果；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片无声的悲凉，使人毛孔悚然的死的寂静。而后，诗人又写：“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二十个字生动描绘了饥妇弃子的场面。婴儿的哭声，饥妇的泪水，简直要把人们的心撕碎。王粲就是这样写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的。也正是因为他写了这些，所以才能使诗所言者重，所怀者广，所寓者深。这里所孕育的沉郁之情，不能不是杜甫诗风的滥觞。“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不是消极的逃避，这里潜藏着寄希望于将来、要拯救人民于水火的决心。王粲正是对战乱深恶痛绝，所以他才能对一切有利于安定民生的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给予了由衷的赞美，表达了抑制不

住的喜悦。他在《从军诗》第五首中，用对比手法生动地展现了太平康乐的谯郡和其它所经之地的天壤之别。王粲的诗有悲哀、抑郁、凄凉之声，也有欢快、舒展、喜悦之情。这两种调子在同一首诗中有鲜明的对照，在不同诗中也是如此。这一切无不受他的境遇、心情所制约。

王粲依刘表，刘表不能纵观大局，欠韬略，心胸狭窄，王粲不得舒展大志；此时他忧多、愁多、愤懑多，常有怀归之心。《七哀诗·其二》就是写他“忧思壮难任”之情的。诗的调子是低沉、灰暗的。但在这低沉、灰暗之内有着诗人奋发向上的志向。王粲跟随曹操后则有了变化，因而有些创作显示出他自己前所未有的朝气。试比较《从军诗》和《七哀诗·其二》，全然是两种心境、两副情肠。

《从军诗》是王粲随曹操征东吴，途中有感而作。王粲被曹操出色的军事、政治才能所鼓舞，他把征战中的一切都看成是欢乐的；尽管征途中有这样、那样的辛苦，但是他能以苦为乐，志气昂扬。他说：“从军有苦乐，但闻所从谁。”他在比较中知道，同是征战，如果是“所从神且武”，那么“焉得久劳师？”跟随有才能的人征战，就不会遭受不必要的劳顿。他一反“归欤”的哀叹，决心“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表达了热情洋溢的积极入世思想。在长期征战中，王粲也产生过思乡思家的念头；然而他想到自己是跟随神武之师去征战，为安定民生效力，就立即振作起来，并自责“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这一切都表现了王粲积极向上的激昂情绪。历代有不少人评王粲诗，多议其“慨怆”，“苍凉悲慨”；多举其《七哀诗》为建安体的代表作，而往往忽视他的《从军诗》。所谓建安体、建安诗风不仅是“悲凉”，更重要的是“慷慨”。“慷慨”中含有积极向上的

伟壮之情。建安时代是大有作为、积极向上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思想就是这一时代统治者的思想，即曹操的思想。曹操的思想概括一下就是：统一天下雄心勃勃，百折不挠顽强进取。建安诗风，表现最突出的则是曹操，此外在作家中就属王粲了。王粲的《从军诗》五首场面宏大，括意深广，这在当时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在论王粲诗作时，在注意到他以《七哀诗》为代表的悲凉、沉郁的风格之后，还应注重他以《从军诗》为代表的乐观、进取、积极向上的风格；这才是王粲诗的全貌。

王粲的诗通俗、质朴，有明显的乐府民歌化倾向。诗的字里行间感染力极强，绝少文人诗的造作之感。乐府民歌主要特点有二：一，自由、朴素的形式；二，现实的内容。这两个特点使乐府民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它不仅能代代相传，沿续不断，而且能以巨大的动能和结合力，冲击改造着文人的诗。受到乐府民歌深刻影响的王粲的五言诗，写于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年代这么久远了，可是我们今天读来仍然觉得很近，几乎不用多注就能看懂。这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王粲依照乐府民歌的风格、方法进行创作，诗中很少用生僻的典故，难懂的字词，其通俗犹如口语。关于这一点，读一读集中五言诗便能明显地感觉到。此外，乐府民歌化倾向在王粲诗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王粲的诗大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失“诗言志”的传统的。或写对战乱的哀叹，或写怀归的情思，或写志不得展的郁闷，或写“愿奋薄身”的激昂……诗中处处有“我”在，使人读后牵动情怀，十分亲切。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王粲用现实主义方法写了历史的真实和个性的真实。

王粲的诗通俗、质朴而又不乏文采。他的诗有一种自然的美，有一种深沉的内在力量。他的五言诗对前人来讲是一个重要

突破。

建安之前，一些著名文人的五言诗还不是十分成熟的。多数人公认的班固、张衡的五言诗就是这样。如班固的《咏史》，张衡的《同声歌》，虽然也是有感而发，但表现力极弱，缺乏生动的形象，没有什么感染力，正如论家所言，实是“质木无文”（钟嵘《诗品·总论》）。本来十分激动人心的事，到了他们的五言诗中却平平淡淡；特别是语言的运用，非常板滞。固然，这里有诗人本身文学修养的关系；但一个文体形式自身发展规律（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比较一下，同是咏史，班固和王粲则大相径庭。班固写的是一个女子为救父亲，上书给汉孝文帝，孝文帝为之感动，女子的父亲终于得赦一事。王粲写哀悼秦三良（三个贤人）被殉葬一事。比较以后我们会感到，王粲的咏史诗想象力丰富，其中有不少生活细节的描写，有生动的发问，有自然的议论。“妻子当门泣”四句用日常生活的情景和比喻（“涕下如纆縲”，用井绳从井中取出水流不止、牛缰绳上涎水不绝，来比喻泪下不止貌），这有多么生动、形象。这就是用乐府民歌手法来叙事状景。而班固的咏史诗只有一派文人气，呆板、苍白，概念多于形象。

钟嵘《诗品》以“滋味”论诗。他把那些“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富有艺术魅力的诗列为上品。王粲被列为上品是当之无愧的。王粲善于从生活中感受出诗意来，又善于用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手段表现这一番诗意。王粲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抒情、状物，所以他的诗被称为“五言之警策”，“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如在《杂诗》中，他用拟物、拟人的手法写了自己要变成鸟，又写了鸟的怀春，用人禽同情的浪漫手法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写了对理想的向往；在《从军诗》中睹物抒情，

连类不尽，在《七哀诗》中用现实主义白描手法写离乱，写思乡。王粲的诗不仅在全篇的结构、总体的感觉上显示了有文采，有滋味，在具体的诗句上也是注重语言的使用的。他注重对仗的优美，音韵的和谐，所以他的诗读来十分流畅，有珠玉之声。请读王粲《杂诗·其一》：

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方轨策良马，并驱厉中原。北临清漳水，西看柏杨山。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

这首诗一共八句，中间四句对仗工整，隔句用韵，压于平声；这和后来的五言律诗从形式上已有近似之处了。也正因为注意了这些形式上的美，所以读来琅琅上口。由此可知王粲的五言诗，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的诗之所以能流传久远，这不仅由于诗本身具有较充实的社会内容，也由于诗本身具有较完美的艺术形式。

王粲的诗优点固然不少，但从诗发展的角度而论，用比较的眼光考察，他的诗尚不能独冠当代。和王粲同时代的曹植，不仅从乐府诗中吸取营养，且能从汉末文人诗中吸取精华。曹植的许多诗篇，如《送应氏》、《赠白马王彪》等，已重视“声律”，即重视平仄的运用，使诗呈现出节奏美，这是诗歌的革新。王粲对此则注意不够。总之，在诗的数量之多，艺术性之高等方面，王粲不如曹植。

## (二)

纵观王粲的著作，他是以赋见称的。如果说在建安时代，王粲的诗尚不能独冠当代，那么他的赋是称雄当代而无愧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

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衡）、蔡（邕）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曹丕这段话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是，王粲以赋见长；二是，他的赋为张衡、蔡邕这些汉代大辞赋家所不能超越；三是，在王粲本人，他赋的成就也高于其他文体的成就。令人惋惜的是，象王粲这样著名的赋家，如今存留在《王粲集》中的赋作仅剩二十五篇，而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佚文。

王粲的赋在建安文人中，一是数量较多，二是质量较高；与前代赋家相比，他的赋标志了抒情小赋的成熟，标志了赋这个文体发展的新阶段。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对王粲则诗赋并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曹丕的品论则比刘勰深远，他认为王粲不仅在建安七子中为赋之冠，而且超过了前代一些重要赋家。为了说明这一重要成就，必须着重论述“王粲的赋标志着抒情小赋的成熟”这个重要问题。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言情的，都是作者主观的流露；只不过手法不同，隐显各异；不言情的，不是文学。赋也一样，赋是从诗、文中脱胎出来的，它必然带着母体言情的天性。赋的出现是以言情为目的的。汉赋“贾谊登堂”，而他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便是以抒情为主的作品。可是赋这种文体到后来变化很大。由于帝王贵族们的需要，一些文人就写了大量以铺陈、堆砌辞藻为能事的长篇大赋，代表作就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这两篇在《文选》中是一篇）。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典范，此后无论西汉或东汉大赋，大都是摹拟之作。其内容大都写宫廷苑囿，车骑畋猎，声色犬马；极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且又多用奇僻字。这些均为大赋的弱点。但是，我们也应看

到大赋的另一面，它毕竟也曲折地反映了上层统治者的欣赏趣味；其内容也反映出汉代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汉代大赋对后代仍有认识价值。由于大赋追求艺术技巧，重视细腻的描写，在某些方面艺术性是较高的。这些对后代骈文、散文的发展均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赋走上摹仿道路之后，它终于走进了死胡同。应社会的需要和文学本身发展规律要求的抒情小赋，以健美的姿态走上文坛，使大赋黯然失色。

东汉末年，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地主阶级内部一些人对时政产生了不满情绪。为了倾泻心中的郁闷，不少人写起了抒情味浓郁的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文学史上称之为“抒情小赋”。这种抒情小赋的产生，无疑是赋这个文体的福音。可惜的是张、蔡等人只是偶尔写一些小赋，他们的主要创作还是大赋，他们没有沿抒情小赋的创作道路走下去。那末，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以为是，东汉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文人不能随便发议论，否则会大祸致身，这是政治上的约束。此外，旧的，写大赋的传统势力还很大，一时不易扭转，这是文学样式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而这两方面，到了王粲生活的建安时代则发生了变化。建安时代冲破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禁条，人们的思想是解放的。军阀之间各据一方，唯才是举，唯贤是用成为社会风气，大有百家争鸣之势。思想的解放为政治上冲破传统大赋的写作提供了精神力量。特别是曹氏父子，他们作为帝王将相带头写直抒胸臆的诗赋，这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王粲在当时写了大量的抒情小赋，几乎没写过一篇象《子虚》、《上林》那样的大赋，这决非偶然。这说明王粲是以一种自觉的精神从事抒情小赋的创作，也正因为这一实践活动使抒情小赋的成熟期到来了。

王粲的抒情小赋有什么特点呢？

王粲的抒情小赋顾名思义，一是以抒情为主，一是篇幅短小。这两个特点是统一的。尽管现存王粲的赋作有不少篇均有佚文，但我们可以推测其原文也不会太长。这是王粲的写作方法决定的。按王粲这种写法绝不会产生象司马相如《子虚》、《上林》那样长达四千余言的赋篇。因为王粲的赋以抒情为主，不是以铺陈为主，这就截断了那种专以铺张赘言为能事的道路。依抒情写法，文趋简炼；因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象《登楼赋》这么深情委婉的赋才不过三百多字，其它赋则可想而知了。

形式，是一种外在表现，它决定于内容。王粲的赋在形式上的短小，正是内容的真挚所要求的。王粲一改汉代辞赋家“为文而造情”的写法，而是“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为情而造文”（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他的赋源于深厚的生活感受，抒发了真情，所以能打动人心。他的赋作名篇《登楼赋》，千百年来被世人珍爱。此赋通篇情景交融，如水中著盐。建安的赋受诗的影响较深，诗人又是赋家。王粲就是用写诗的方法作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往情深。《登楼赋》用“登兹楼以四望兮”开篇，写了通浦、长洲、广陆、沃流、陶牧、昭丘多处蔽野的华实与盈畴的黍稷等一系列景物；诗人的忧郁情绪在广阔空间徘徊，使一切景物都染上忧郁的色彩，景语亦是情语。

王粲赋中的叙述语言也都是抒情的。我们读了《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一段，即可看到这一点。这些叙述语言都来自心灵深处，是动了真情写的。这样的赋作，把读者带到了他的境遇中，他的情绪变成了读者的情绪，这就是“移人性情”。这种强烈的感染力是《子虚》、《上林》等大赋远

不可比拟的。在这一点上王粲比司马相如以及张衡、蔡邕要高明。

王粲在赋中常用借喻的手法抒情。他所借用的事物是常见的，使人读之生动亲切。如“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登楼赋》）这里他用匏瓜空空地挂着而没人使用它，并被淘清后而它的水仍无人去吃，喻自己有才能而无处施展。他没有以单纯的议论入赋，而是借助了形象的力量，这就是古人讲的用“比法”，今人讲的运用“形象思维”。

王粲在赋中注意写复杂的内心活动，这是前代赋家所少见的。如他在《神女赋》中，写了对神女热烈的赞美，又写了他恋恋不舍，同时还写了内心的争斗：“顾大罚之淫愆，亦终身而不灭。”最后是“心交战而贞胜，乃回意而自绝。”这种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在赋中表现和王粲的诗作是异曲同工的，也是赋中独特的创造。

王粲的赋和他的诗一样，都受到乐府民歌深刻的影响。他的赋语言朴素、明快，和司马相如的大赋形成鲜明的对照。王粲的赋大多没有雕琢的痕迹和晦涩。而司马相如长达二千四百多言的《上林赋》，其中有些文字不但难以看出是在抒什么情，也难看出是在状什么物，倒象类书和字汇一样。这就阉割了文学作品以抒情为主的功能，把赋引上了死胡同。王粲的赋则是赋的抒情本性的回归，是赋这一文体的新生。

王粲的赋题材广泛，除了在激情冲动下而写的篇章外，还写了不少咏物的赋；有咏器物的，有咏植物的，有咏禽鸟的。王粲的咏物赋也从不作纯客观的描状，而皆是兴发于此，意归于彼，都是托物抒情，托物寄意。《鹦鹉赋》就是借咏鹦鹉来写对自由

美好生活的追求。“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王粲总是以情为主来统帅文辞；题材变，“为情而造文”之本不移。

王粲在抒情小赋上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也存在不少缺陷。汉代大赋的影响在他个别赋篇中还有残存，有的赋使用了生僻的典，晦涩的字、词；影响了赋的通脱、流畅。此外王粲赋的社会内容较诗狭窄，这一点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赋的思想性。

《王粲集》除诗赋外，还有论、释、铭、檄、颂、赞等作品十八篇（新增补之《英雄记》未计算在内）。王粲的论六篇：《难钟荀太平论》、《爵论》、《儒吏论》、《三辅论》、《安身论》、《务本论》，就其内容来说有较新之观点，许多是针对时弊而发，乃研究王粲的宝贵资料；但就其艺术性、战斗性而言，则不能与贾谊、晁错的论文相比。至于其它颂、赞、铭、释等文，多为应制之作，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无特色，故无可称道。

### （三）

王粲在建安七子中的文学创作成就，堪称卓绝；而他之所以能取得如上所述的成绩，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

汉末，汉王朝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危机。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导致农民大起义。黄巾军的起义敲响了汉王朝灭亡的丧钟。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宦官与外戚的权势之争，终于导致长期军阀混战。汉末的政治危机，还反映在信仰的崩溃。从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极力倡导独尊儒术和谶纬宿命，到汉末已有三百多年。此种思想危害之深，在西汉时还不十分显著。到了东汉把儒家思想神化的弊端越来越显著了。东汉统治者不仅引导文人读经，还鼓励注释经书，致使“一

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如此提倡读经、注经，其后果则使大批士人被这种“奴才家法”所束缚，从而导致思想僵化，万马齐喑。

物极必反。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的局面，到汉末被打破了，各种政治思想便活跃起来。思想的解放，表现了人的觉醒。人的觉醒，特别是文人的觉醒，又使文学创作出现了繁荣。建安文学的繁荣，正是在此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建安文学内容的最突出特点是作家能正视社会现实，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希望统一，并为统一大业而尽力。王粲的著名诗赋较典型地体现了上述特点。建安文学是时代的产物，王粲的文学成就与时代有着密切关系。

王粲文学成就的取得，还与他能够适应文学本身的发展要求有关。如前所述，汉代大赋，特别是东汉的摹仿大赋，到汉末已是强弩之末。社会生活内容，文体本身，都迫切要求崭新的，能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抒情小赋的产生和繁荣。在此种情况下，王粲适应了这些要求，创作出较多的抒情小赋。五言诗，如《古诗十九首》，虽在东汉时产生，并得到发展，但其内容和形式都要求有一个新的突破。王粲的五言诗也正是适应此要求进行创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王粲优异的文学成就的取得，又与他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王粲生活的年代，正是天下大乱之际。他八岁时，具有空前规模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十四岁（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时，汉献帝刘协迁徙长安，他也随家同迁。十六岁时，王允、士孙瑞等杀董卓，并召王粲为黄门侍郎，王粲不就。随即董卓部将李傕等又杀王允，西京长安大乱，王粲离长安往荆州襄阳避乱，依刘表。刘表当时是荆州刺史，徙治襄阳，表与粲同乡，两家有世交，但

是刘表不能尽用王粲其才，嫌弃王粲相貌不美、性格放达，本来想把女儿嫁给王粲，终不舍。至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刘表卒，王粲在刘表手下呆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正是王粲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青壮年时期；然而这十六年他才不为用，志不得展，使他怀着深深的抑郁之情。人生的坎坷使王粲愈来愈沉实了。骐骥思奔，时刻期待明主；为此，当刘表卒后，曹操兵至新野之时，王粲便毅然劝说表子刘琮归附曹操。曹操到处发现人才，委以重任；王粲也因说刘琮有功辟为丞相掾（起草文件的官），赐爵关内侯。后来王粲迁升为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为侍中。

王粲归曹操之后，除随其南征北战外，他和当时著名文人如曹氏兄弟（丕、植）及文人刘桢、应玚等有十分亲密的交往。所谓“邺下文人集团”，就是指以曹丕、曹植、刘桢、应玚、陈琳、阮瑀、徐幹、王粲等人为主的文人集团。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有一段深情的回顾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简略地回顾王粲生活在人世四十一年，毫不夸张地说，这四十年不亚于太平盛世数百年。正由于王粲经历曲折、复杂，生逢乱世，这些对他的文学事业起了积极作用。文学的主要源泉是生活。王粲的经历，王粲广阔的社会生活使他写出了不朽的诗文。

家庭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文化教养，对王粲后来文学成就的取得也是很重要的。王粲生身于高级官吏家庭，曾祖父王龚有高名，顺帝时官至太尉；祖父王畅在灵帝时官至司空。父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封建社会的上层官吏，大多数为读书人家的子弟；尤其是东汉，不入太学，很难做官，更难做大官。从特定历史条件，我们可以知道王粲幼年时受教育的条件较一般